

· 港澳研究 ·

主持人語：

數據在數字經濟時代正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數據要素的跨境流動問題既是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要素市場一體化的內生性要求，又是數據資源跨境配置的重大理論問題。符正平教授《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要素跨境流動研究》一文，敏銳地揭示了這一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圖景——借鑒全球數據跨境流動的治理模式與發展趨勢，大灣區可以從制度、數據要素市場、技術體系三個方向，探索既能便利數據跨境流動又能保障國家安全的機制，以求實現數據利用與數據保護的平衡，進而成為數據“雙循環”的戰略支點。

符教授認為，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生產要素，為了充分釋放數據紅利，需積極推動數據要素跨境流動。粵港澳大灣區呈現出“一國兩制、三法域、三關稅區”的獨特局面，是實現數據要素國際國內“雙循環”的絕佳試驗田，可以結合大灣區的現實情景和制度背景，開展創新性的數據跨境流動路徑探索。數據有效流動的關鍵是在確保國家數據安全的前提下，通過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最大化地發揮數據的價值。符文在分析數據跨境流動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上，對不同國家/地區數據跨境流動的規制進行了全面的梳理，比較研究了數據跨境流動全球治理的模式與發展趨勢。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和數字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在國家大數據戰略布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大灣區具有戰略交匯機遇以及制度差異帶來的數字經濟疊加紅利、數字化轉型等發展機遇。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在數字經濟發展基礎條件、數據要素應用需求等多個層面已初具規模。大灣區“三法域”的特殊背景是中國探索數據要素安全有序流動特有的制度優勢。作者認為，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完善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是推動數字化高質量安全發展的必由之路。

相對於符正平的數據要素跨境流動研究，婁勝華的《跨域服務：澳門社團灣區服務實踐及其治理創新》則是另一種值得關注的“跨境流動”。

從歷史上看，粵港澳三地一家親——本來就是關係密切的鄰居。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賦予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共同富裕的一次極佳的歷史機遇。隨著灣區建設的推進，近年越來越多的澳門居民前往內地珠海、中山、江門等市居住、養老、就學與創業。生活在內地的澳門居民產生的服務需求，推動了澳門工聯總會、街坊總會、婦聯等社團組織前往灣區設立服務機構提供跨域服務。早在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正式頒布之前，澳門就有一些主要的社團在國家、廣東省有關部門的支持下進入大灣區設點服務。澳門社團的跨域服務包括移植性服務與特別服務兩部分，移植性服務包括家庭服務、長者服務、青少年服務、社區服務以及個案輔導等；而特別服務則是根據居住於內地的澳門居民特殊需求而增加的服務，包括疫情防控服務、法律諮詢服務、青年創業就業服務、轉介服務等。在服務模式上，多數社團延伸澳門服務方式至內地，以自辦方式向住地居民提供服務。跨境服務突破了行政區域服務的限制，彌補了服務縫隙，實現了多元主體之間的合作，重構了在地服務關係網絡與伙伴關係。澳門社團的跨境服務機構，有效地連結了兩地資源，對接兩地政府的服務，推進澳門居民融入灣區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社會治理的創新。

婁勝華教授多年從事澳門社團研究，收穫甚豐。作者認為，澳門社團的跨域服務已取得較好的實踐效果，澳門主要社團以其非政府性、親民性、靈活性、網絡性與嵌入性，可以成為跨域治理的有效中介與平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域服務實踐中值得社會各界更多的關注。（劉澤生）